



| 中 卷 |

中国现代政治史

ZHONGGUO XIANDAI ZHENGZHISHI

■ 吴汉全 著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 中 卷 |

中国现代政治史

ZHONGGUO XIANDAI ZHENGZHISHI

吴汉全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马长虹

封面设计:周方亚

版式设计:胡欣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政治史/吴汉全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01-014358-3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政治制度史—中国—1919~1949 IV. ①D6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2365 号

中国现代政治史

ZHONGGUO XIANDAI ZHENGZHISHI

吴汉全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76.25

字数:120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4358-3 定价:160.00 元(全三卷)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中 卷】·

第十章 苏维埃革命的开始	391
一、南昌起义和八七会议	391
二、各地武装起义和苏维埃口号的提出	401
三、中共“六大”的召开	415
第十一章 国民党军阀的混战及中间政派的活动	423
一、国民党各派军阀的大混战	423
二、中间政派的活动与主张	437
三、中国托派的政治主张	449
第十二章 工农红军的创建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扩大	457
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457
二、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形成	482
三、古田会议的召开	491
四、苏区土地革命的开展	500
五、李立三“左”倾错误的纠正和王明“左”倾错误的出现	507

六、红军的反“围剿”战争·····	528
第十三章 九一八事变发生及全国抗日民主浪潮的兴起 ·····	533
一、九一八事变与国内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 ·····	533
二、国民党内的宁粤分裂和统一 ·····	548
三、王明“左”倾错误的继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	557
四、淞沪抗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国策 ·····	565
第十四章 国民党统治的法西斯化和官僚资本的形成 ·····	572
一、国民党政权的法西斯化 ·····	572
二、国民党思想文化的法西斯化 ·····	579
三、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形成 ·····	583
第十五章 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与蒋介石的对日外交 ·····	591
一、抗日民主运动的持续发展 ·····	591
二、蒋介石政府对日本的外交 ·····	601
第十六章 曲折中的苏区革命及红军长征 ·····	606
一、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与川陕苏区的开辟 ·····	606
二、苏区各项建设的主要成就 ·····	611
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红军被迫长征 ·····	627
四、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	644
五、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抗战 ·····	658
第十七章 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国内和平的实现 ·····	661
一、华北事变与一二·九运动 ·····	661
二、瓦窑堡会议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确定 ·····	679
三、国共两党各自政策的调整 ·····	683
四、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 ·····	698

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708
第十八章 全民族抗战的开始	718
一、七七事变与八一三事变	718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733
三、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积极抵御	738
四、中共洛川会议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744
五、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正面战场的继续	765
六、沦陷区伪政权的建立	789

第十章

苏维埃革命的开始

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引起革命的因素及基础仍然存在着。在革命失败的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敢不敢坚持革命的问题,回答是肯定而坚定的。他们“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①对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地举起了武装反对国民党的旗帜,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武装暴动,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开始了创建工农红军、开辟红色根据地、建设苏维埃政权的伟大实践。

一、南昌起义和八七会议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失败的教训,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此时,如何继续坚持中国革命,这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的问题。南昌起义和八七会议,标志着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开始,中国的政治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1. 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

汪精卫“七一五”分共使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大好形势化为乌有,中国革命陷于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中。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24日发表《对于武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

汉反动时局之通告》，指出国民党领导机关已经“完全屈服于反动势力”，“七一五”政变使得“汪精卫派之虚伪主义现已完全揭破”，并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认武汉中央政府已完全反动，武汉不再为革命中心而为反革命中心”；“与国民政府合作之条件基础既已消灭，当然应立即召回国府内之党员”；“积极宣传反对武汉中央的反动政策”^①。

1927年7月下旬，到达九江的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叶挺、聂荣臻、恽代英等议决，放弃原来联合张发奎回师广东的计划，改以在南昌发动军事暴动，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这个决定得到中共中央常委会批准，并派周恩来组织前敌委员会领导暴动。

但在7月26日，共产国际来电指示：“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不可举行南昌暴动。”于是，中央常委会即派张国焘赴南昌传达。但张国焘于7月30日到达南昌时，暴动已是箭在弦上。张国焘传达了共产国际的知识，并以起义没有绝对把握、没有得到张发奎的支持与同意，反对立即起义。张国焘的主张，遭到了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谭平山等的坚决反对。关于张国焘反对起义的情形，吴玉章有如下的回忆：

对于这次起义，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一个前敌委员会来领导，由周恩来同志担任前委的书记。前委开会的时候，曾发生很大的争执。张国焘主张要拉拢张发奎，若张发奎不同意，就不要举行起义。周恩来、恽代英等多数同志都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意见，认为我党应独立地担负起义的领导责任，不能对张发奎存有幻想，更不可依赖他。最后通过了多数的意见，决定8月1日晨4时举行起义。不料这个秘密，被二十军的一个军官泄露给朱培德的部下，于是前委又决定把起义时间提前两小时。^②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63—364页。

② 《吴玉章文集》下卷，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5页。

就在这次前委会上,谭平山对张国焘反对起义的主张甚是气愤,要求将张国焘捆绑起来予以枪毙。谭平山后来主要是因为对中央代表有不敬态度,被瞿秋白中央开除了党籍。由于大多数坚决主张在南昌发动暴动,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意见,遂决定8月1日晨2时如期举行起义。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南昌起义呢?大致有以下原因:

第一,南昌在大革命时期建立了良好的基础,准备了骨干力量。大革命时期方志敏、邵式平在江西领导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另外,在南昌有一批党员骨干。

第二,中共在南昌直接掌握一部武装力量。当时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中,计有: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由原叶挺独立团改编而成,骨干是周士第领导的一个团;第二十军,军长贺龙。这三支力量,均被武汉国民政府派驻九江一带,参加“东征讨蒋”。

1927年7月26日,汪精卫通令叶、贺到庐山开会,将所部集中德安,阴谋消灭这两支革命武装。当时担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赶往叶、贺部驻地,共同商量对策。叶、贺决定拒绝执行汪的命令,而将部队开往南昌。

在南昌,共产党还掌握有朱德领导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

第三,南昌附近的敌人兵力比较薄弱。当时,在南昌的反动军队,总计只有3000余人。因此,在南昌易于举行暴动,并能取得成功。

中国共产党为了发动南昌起义,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准备:

一是于1927年7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南昌成立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成员还有:李三立、恽代英、彭湃等。

二是在7月28日,成立南昌起义总指挥部。

中国共产党在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之后,将南昌起义提上日程。1927年8月1日凌晨,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下,举行南昌起义,五个小时解决战斗。起义成功后,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25人组成,有国民

党左派参加,共产党员占多数。委员会下设主席团,由7人组成。主席团下设参谋团、党务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农工委员会、总政治部、政治保卫处和秘书厅等机构。这是以共产党人为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领导机构。这个机构发表了《联席会议宣言》和《中央委员会宣言》等文件。内容:确定革命的新根据地,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继续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继续为解决土地问题和打到乡村封建地主、反动势力而奋斗,扫除蒋、冯、唐等新式军阀等。革命委员会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这是因为当时中共尚在执行复兴国民党左派运动的计划,借此“继承国民党正统”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实际上,这个“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政权。

二是进行部队整编。由周恩来、贺龙、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构。部队经过整编后,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代总指挥,叶挺兼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军:第二十军,军长由贺龙兼,党代表廖乾吾;第十一军,军长由叶挺兼,党代表聂荣臻;第九军,副军长朱德(军长未到任),党代表朱克靖。

三是实行战略转移。8月3日至6日,部队按原计划陆续退出南昌,进军广东。起义军兵分于三河坝、汤坑等地,在优势敌军的围攻下,遭到失败。关于起义军分兵后遭受失败的情况,朱德有这样的回忆:“起义军进到广东后分成两路:主力进至汕头、揭阳地区;另一部分在三河坝,由我指挥。当听到潮汕方面我军遭敌攻击时,我们即由三河坝南下接应,行至饶平,接上了由潮汕地区撤出的一部分部队约二百人,才知道我军战斗失利,已经散失。我们加上这一部分部队共约二千余人,又折转北上,在武平旧城和敌人一个师打了一仗,然后转到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这时部队更涣散了,由三部分集拢在一起,有周士第的一部分,有潮汕撤出的一部分和我原来指挥的一部分,七零八落,没有组织。有些人中途跑掉了,留下的人也还有继续要求走的。”^①起义军余部由朱德、陈毅率领转入湘南,在湘粤赣边开展游击战争;另部分转移海陆丰

^①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4页。

地区。

南昌起义是在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挽救中国革命的英勇壮举,谱写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领导人民继续革命的壮丽诗篇。面对国民党的血腥屠杀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而是在对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的总结中,认识到军事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独立地举起武装斗争的光辉旗帜,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建立自己的军队。毛泽东指出:“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①因此,南昌起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第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竖起了坚持革命斗争的光辉旗帜;第二,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第三,南昌起义以实际行动反击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由于缺乏在新的形势下坚持革命的经验,南昌起义最终是失败了。失败的具体原因:一是没有立即与当地农民运动结合,就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政权;二是采取了孤军南下的策略,企图回广州后重整旗鼓,再行北伐;三是在进入广东后又有两次分兵的失误,最后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下,遭到了失败。在这三点原因中,最主要的还是第一点原因。1944年,周恩来对南昌起义后的失误有如下的分析:

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8页。

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①

朱德在1962年的谈话中,也认为没有就地进行革命是南昌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他说:

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全部南下,目的是想去广东汕头找外援,结果在广东潮汕地区遭受失败。失败的主要教训,就是起义军没有和江西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而去了广东。假如当时能够利用军阀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就在江西各地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也改造起义军本身,那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②

2. 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蔡和森、毛泽东等出席了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的记录稿,会议的主持者之一李维汉说:“在国际代表未来以前,国际曾有一训令,对中央提出许多错误,指明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并要中党开一紧急会议,指出此倾向并改组中央。后国际代表到,对此亦谈得很多,并决定召集紧急会议。此会议原定七月二十八开,后因种种关系不果,直至今日才实现。”^③因此,这次会议是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召开的。

会议听取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所作的报告和瞿秋白关于党的新任务的报告。毛泽东等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会议发表了著名的《告全党党员书》。

八七会议有着重要的历史功绩:

第一,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错误。大会指出,在国共合作和大革命过程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3页。

②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3—394页。

③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5页。

中,在共产党内部有一条“妥协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强调“所谓现时必须退让的理论”,认为“共产党及跟他革命的工人与农民,已经走得‘太远’了!现在必须让步来挽救与国民党的联合”。对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形成与危害,会议通过的《告全体党员书》指出:

当土地革命刚刚开始发展,当工农的群众运动刚刚走入大道,并且群众自己想到武装自卫的组织,正需要共产党的积极参加,使革命前进并巩固与国民党群众之实际联合,筑下坚固的革命基础的时期,而共产党的指导只是说要退让,要退步,以为这样就可以营救自己在国民党的状况,创造了整个退让的理论。但可惜这不仅是一个理论,而且还要步步实现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日常工作;拒绝土地革命,为着所谓“过火”,赞成成批的解散工农的组织,以同样的口实去解散劳动童子团。在湖南问题的胆怯政策与最后好听的自动解除武汉的纠察队,所有这些都是最近几个月中央所指导的整个的退让投降政策之一部分。这条退让投降的道路集大成于七月三号中央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十一条国共关系的决议案,……这已不仅是机会主义与妥协了,这简直客观上是十足的取消派,不仅完全放弃共产党的独立,并且取消了一般革命群众运动之存在!把所有的群众运动完全交给国民党资产阶级领袖去监督,并且是自动的交出来,还要说这是“照例”。——这不是客观上对于群众运动出卖,对于革命变节是甚么呢?①

第二,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湘、赣、粤等省发动农民秋收暴动。会议通过的《告全体党员书》明确说明,“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封建制度之一切社会经济政治的遗毒”,“现时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指出: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9—431页。

反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同时就在以全力反对地主豪绅的政权。封建制度破坏,就是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加以严重的致命的打击;而要破坏这一封建制度,又只有用剧烈的土地革命的方法。农民反对地主豪绅及强盗式的政府机关之阶级斗争,是民族解放运动之必要条件和不可分离的成分。土地革命愈坚决愈剧烈,农民群众加入斗争的愈多,歼灭地主豪绅的统治愈严厉——则国民革命的规模愈广大,国民运动的胜利愈巩固。^①

瞿秋白在会议的报告中,从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的关系强调两者结合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须燃着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②。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③

会议决定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实施农民暴动计划。对于中共领导机关过去不重视武装斗争问题,八七会议进行了认真的检讨和深刻的反思。指出:

对付这种军队(指国民政府的军队,——引者)的方针自然应当是:完全注重兵士的群众,而不是要注重那些反革命的将领,要在兵士及下级士官中实行广大的工作,使军队之中亦有反抗反革命的支柱。……然而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3—414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00页。

③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2—393页。

党的指导机关的观念及行动,恰恰如此相反。一切政策及工作都只是和将领办外交,只注重种种方式的军事结合。实际上在兵士之中没有任何工作,并且也并没有丝毫尝试。虽然军事问题重要,然而第五次大会没有特别去讨论,而中央军委讨论了四个月军队中工作的问题,仍旧是没有决定。

这种对于军队的态度,就使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中央军委对此完全没有工作,没有提及一般共产党员的军事训练,这实是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没有提及有系统的聚集那零星散乱的工农武装队,使成为一有组织的坚固力量,以便做发展革命的真实拥护者;没有想尽方法地取得武器,以武装工农。中央那时认为武装工农是难以实现的,甚至于以为是有损于与国民党军队领袖联络的。经过如此之久的时候,中央忽然“积极”起来,不过恰好是相反的积极,决定叫汉口工人纠察队“为避免挑拨离间及冲突起见”自动的解除武装。这不是公开的取消主义是什么!①

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批判了中央过去“对于农民运动指导的摇动不定”,客观上起了“破坏农民暴动”的作用,决定共产党“转变过去的方向,坚决的发展与提高农民革命”,立即在农村开展农民暴动工作,确认真“农民暴动之中应当以贫农为主力,联合一般失业的贫民会党等势力”,将组织和领导农民暴动作为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指出:

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省份做农民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6—437页。

暴动的组织者。^①

第三,会议选出了中央临时政治局,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后又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常委)。

八七会议是在现代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举行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②八七会议明确提出了“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表现了敢于承认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并开始了独立探索和领导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这表明八七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前进了一大步。可以说,八七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标志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国民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限于历史条件及中国共产党当时的理论水平与斗争经验,八七会议也存在着比较显著的缺点。其缺点主要是在纠正右倾错误的同时,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滋长了“左”倾错误。具体表现为:

一是在理论上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认为两者之间“并没有截然分为两段的界限”;

二是没有恰当地估计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因而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只是强调暴动和进攻,而不懂得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需要有必要的退却;

三是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之争,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不适当地强调领导干部的单纯工人成分的意义。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6—957页。

二、各地武装起义和苏维埃口号的提出

八七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各地开展武装起义,掀起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并在军事暴动的基础上提出了苏维埃的口号,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1. 湘赣边秋收起义(1927年9月9日)

在南昌起义之前,中共中央即有“秋收暴动计划”。当时,中央打算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及特别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以便配合南昌暴动。192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给南昌起义前委的信中说:

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争斗。因此这一暴动,应当与中央决定之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在此原则之下,中央曾训令湘粤赣鄂四省立即进行,响应南昌暴动:一方牵制破坏压迫“南昌”之敌,一方开始秋收斗争。同时决定由前敌分兵一团或二团交由郭亮处,希率领到湘南占据郴宜汝一带,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受前方革命委员会的指挥,并供给相当的弹药。党内由泽东、郭亮、夏曦、卓宣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以泽东为书记,在湘省委指导之下主持之,同时与前委发生关系。除派泽东克日动身往湘南工作,望兄处即遵照此信抽调兵力,交郭亮即日前往目的地为要。^①

南昌起义爆发后,中央积极筹划秋收暴动的计划。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制定了《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确定“暴动的策略”是,“以农会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动员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实行暴动,宣布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5页。